

美术学研究

3



南京藝術學院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东南大学出版社

美术学研究

Theory and History of Art

3

主 编：樊 波

副 主 编：顾丞峰 费 泳

执行主编：丁亚雷 戴 丹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术学研究·第3辑 / 樊波主编.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641-4913-0

I. ①美… II. ①樊… III. ①美术学—文集
IV. ①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9006 号

美术学研究(第3辑)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0.50

字 数:3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4913-0

定 价:6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卷 首 絮 语

刘伟冬 樊 波

美术学是我院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它虽然是上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设立的,但溯其源流则可追至 20 世纪上半叶。这不能不提到人们熟知的大学者和画家陈师曾。他不仅影响和提携了大画家齐白石,而且还培养了美术史论的大学者俞剑华。新中国成立后,俞剑华先生一直执教于南京艺术学院。他一生著述宏富,影响巨大,垂教泽后,广大悉备,学风沿传,至今犹兴,从而为美术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我院美术学学科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台阶,2007 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2010 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同年《中国美术史》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这表明美术学乃为我院的重要学术品牌,它根深、枝繁、叶茂。这样的学科需要一个代表自己学术形象和品质的阵地。

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出版《美术学研究》论集。应当说,如今全国各类艺术类的刊物出版物(包括图书、期刊)不胜枚举,像我院就有《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研究》等刊物。相比之下,《美术学研究》就显得还很稚嫩,尽管它已然拥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如何从众多类似出版物中脱颖而出?如何办出自己的学术特色?我们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设想:

1. 为全国(包括国外)的美术史论学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们需要最杰出的广大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以保证它的优良的学术水准。

2. 着力发现和推动年轻的美术史论学者发表自己的力作,以显示他们的文心才识。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有不少出色的博士生、硕士生论文,角度新颖,论述精到,颇见深度,我们真诚地邀约你们,希望能为学术界注入新的学术血液和力量。

3. 既注重“史”的研究,也强调“论”的探讨。我们认为,美术“史”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但“论”的建树却略显薄弱。实际上,“论”的建树也会给“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眼界和新的思想生机。史论并重乃是本连续出版物的重要学术宗旨。

4. 既重视对古代美术的研究,同时也不忽视对当今美术现象的深度分析和考察。这包括对当下美术创作实践的理论阐发,又包括对当下美术学自身研究方法、发展状况的学术反思和总结。

5. 以学术为唯一准则,绝不发表滥竽充数、谋求实利的劣作。不发表弄虚作假的伪作,不发表套话连篇的“名作”,也不发表陈词滥调的庸作。

《美术学研究》计划每年出版一辑,希望美术史论界同道能关注它、扶持它,祝愿它有不竭的生命活力。

出版前言

樊波 丁亚雷

《美术学研究》出到第三辑了。按照计划,《美术学研究》每年出版一卷,年底前上架发行。这一卷的出版比原本计划的时间有所推迟,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无论如何,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慵懒向广大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

《美术学研究》第三辑主要由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和当代艺术教育论坛会议论文三个部分构成。当然,也有涉及其他领域的一些文章。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美术学研究》中,除了传统的中外美术史和理论研究的优秀学术论文,还能看到更多面向当下艺术问题的思考成果、更多跨越艺术学科边界的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作为一本年轻的读物,我们愿意为年轻的学者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贡献我们的努力。

最后,我们仍然希望在这里对曾经帮助、关心过这本学术“阵地”的所有作者和读者们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感谢。我们知道,在学术也变得日益功利化和功能化的今天,能够不吝为我们赐稿的作者,都是出于一份对学术的信心和坚守,这在今天实属不易。同样,我们也必须对南京艺术学院领导的关怀表示最崇高的敬礼,对你们的包容和支持,我们心怀感激,有了你们作坚强的后盾,我们更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

目 录

中国美术史

三位一体:凌家滩玉鹰的艺术设计与文化解读	徐 峰/3
故宫博物院藏惠崇《溪山春晓图》小考	施帼玮/14
焦竑与顾起元、徐光启	
——晚明史上的三位名士及其书法	薛 翔/22
高剑父与简又文:艺术家及其赞助人	赖志强/28
新中国宣传画叙事策略研究	费文明/45
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发展导论	李笑男/70
学科交叉研究如何成史?	
——以艺术史和文学史为中心	姜永帅/89

外国美术史

文学下的反叛:从高乃依的《贺拉斯》到达维特的《贺拉斯兄弟的宣誓》	杨冰莹/97
明暗系统的起步及其发展	马善程/123
赞助人在卡诺瓦雕塑风格形成中的作用	张子谦/131
意识形态的镜像	
——作为权力关系的摄影	赵 兴/142
少年丢勒与他的老师沃格姆特	欧文·潘诺夫斯基 陈研(译)/168

独创性,偏好,以及绘画作品的定价:斯密和雷诺兹的内在联系	
..... 尼尔·德·马奇 汉斯·J·凡·密尔格洛特 王晓丹(译)/174	
库尔贝的传说	T.J.克拉克 张茜(译)/205
赞助人与画家	
——17世纪的赞助机制	
..... [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 元文平(译)/212	
曼图亚的圣塞巴斯提亚诺教堂和圣安德里亚教堂	
..... 鲁道夫·维特科夫尔 茅丽佳(译)/232	
消费社会的图像与奇观	
——德博与后现代转向:奇观的新阶段	
..... 斯蒂文·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 周睿(译)/237	

当代艺术与信息管理论坛

第一届“当代艺术与信息管理论坛”综述	付晓彤/253
艺术档案的方法与实践	
——以北京大学系列艺术档案工作为例	滕宇宁/260
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对于亚洲当代艺术的分类与项目	翁子健/268
中国当代艺术史研究中的文献问题	黄专/272
“当代艺术与信息管理论坛”发言上海美专的史料搜集与整理	
..... 夏燕靖/280	
意大利罗马四年展档案图书馆收藏管理和服务	王端廷/295
国际艺术档案管理新趋势	朱青生/298
当代艺术与信息管理论坛上的发言	吴鸿/304
批评家年会的实践和作用	贾方舟/310
中国艺术品市场数据的挖掘、分析与管理研究	西沐/315

中
国
美
术
史

三位一体：凌家滩玉鹰的 艺术设计与文化解读^[1]

徐 峰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因玉器的发现而闻名于世。凌家滩文化距今5300~5600年^[2]。该文化的玉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工艺发达、品种多样，最重要的是，从凌家滩玉器的数量、品质、组合及各类特征来看，一个史前的“玉礼”已经昭然可见，先民精神领域内的诸多内容也得以窥之，这尤其在凌家滩文化的几件以人和动物为主题的肖生类玉器身上最能体现，包括玉人、玉龟、玉鹰、玉豕、玉版等。学界过去对于这几类玉器都有相当的讨论，观点多样。本文拟对玉鹰进行探讨，解析玉鹰“三位一体”的艺术设计和文化内涵，并以此为楔子，带出史前东方沿海地区三种重要的动物崇拜，包括鸟、猪与龟，窥视先民“借物（艺术品）言志”过程中流露出的一种“集优化”心理。

安徽考古工作者在1998年凌家滩遗址的发掘中，于M29发现一件整体造型是鹰的玉器（98M29:6，图1）。^[3]此鹰灰白色泛青绿点。表面抛光润亮。器宽扁形。鹰作展翅飞翔状，头和嘴琢磨而成，眼睛用一对钻的圆孔表示，两翅各雕一猪头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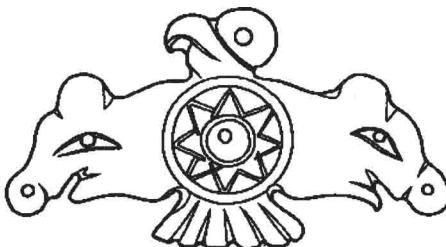


图1 凌家滩玉鹰（98M29:6）

[1] 本文得到南京师范大学校青年人才科研培育项目“中国史前东方沿海区玉文化的考古学观察”（11QNPY06）支持。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8—249页。

飞翔状。腹部规整刻划一直径1.8厘米的圆圈纹，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内又刻一直径0.8厘米的圆，圆内偏左上又对钻一圆孔。大圆的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鹰两面雕刻纹饰相同。

这件玉鹰是一种“三位一体”的设计：整体造型是鹰；鹰的双翅是猪首；鹰腹部是八角星纹。三种不同的元素合于一体，却无不和谐之感，反而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效果。特别是鹰翅和猪首的关系，是一种“兼体”。猪首既是它本身，同时又是鹰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鹰的双翅。兼体的艺术设计在史前玉器的造型和纹饰上可

以看到不少，经常反映在人与动物或者动物与动物的组合中。为学界所熟悉的一例，是良渚文化反山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图2）。萧兵先生较早地指出这是一个兼体的造型，反映的是一个挟乳张牝的大母神形象。^[1]虽然学界关于这个纹饰的组成究竟是人与兽的混合体，抑或仅仅是人或兽还有争议^[2]，兼体的设计却是毋庸置疑的。人的身躯分明嵌入下方兽的鼻梁位置，于是兽的鼻梁既是它本身，又是人的身子。此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来自域外的两类玉器，其造型结构和凌家滩的玉鹰十分相似，也是属于兼体的设计。一类是来自东南亚，在包括菲律宾、东马来西亚、越南中部和南部、柬埔寨、泰国等地均有分布的双兽头玦饰（double animal-headed ear pendants）^[3]。从图3可以看出，双兽头玦饰整体造型也似鹰，而它的双翅却是另一种不知该如何称呼的动物，这无疑是一处兼体的设计。另外，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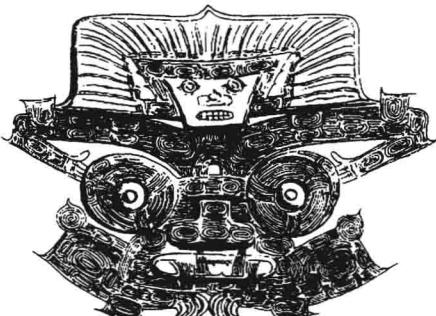


图2 神人兽面纹(反山 M12:98)

[1] 萧兵：《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新解》，《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

[2] 简报称为“神人兽面纹”。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也有学者主张只有人或兽。参见萧兵：《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新解》，《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陈星灿：《良渚兽面纹的构成及其社会心理学基础初探》，《学人》第六辑，1994年。

[3] 双兽头玦饰的年代跨越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属于史前社会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东周至汉。见 Hsiao-Chun Hung, et al, *Ancient jades map 3,000 years of prehistoric ex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PNAS December 11, 2007, vol. 104 no. 50, 19745~19750.

头部也是一处兼体,既是鹰首,同时又是一个玦的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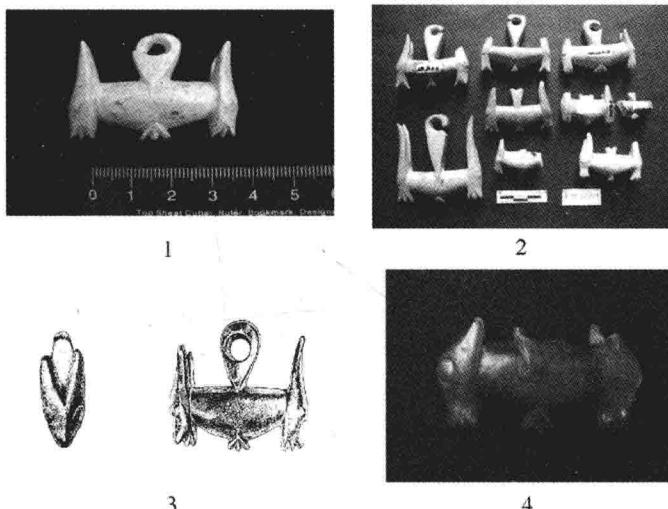


图3 越南沙莹文化中的双兽头玦饰

(据 Nguyen Kim Dung, 第四届东亚考古学大会, 2008)

另一个例子是出自哥斯达黎加的一件蝙蝠吊坠(图4),制作时间约在公元1—500年。吊坠为玉质地,高4厘米,长13厘米,厚0.6厘米,蝙蝠的两翼为鳄首,雕刻工艺栩栩如生,目前由宝尔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无须赘言,这也是一个兼体的设计。

由此看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设计者对于兼体的设计是稔熟的,且乐于打破常规,利用不同的组合来达到一种,至少在视觉上给人以“丰盈”、“多样”的效果。这种外在艺术形式的表达,很可能正是文化内涵或心理意蕴的体现。下面,透过凌家滩玉鹰“三位一体”的艺术设计,结合史前东方沿海地区,以海岱历史文化区^[1]、江淮、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考古学材料,对玉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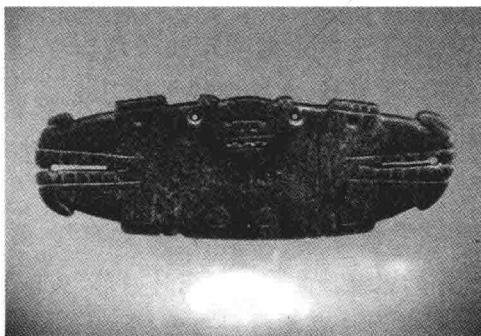


图4 蝙蝠吊坠
(宝尔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

[1] 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的文化内涵进行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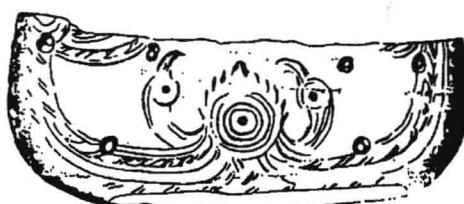
二

首先是作为整体造型的鹰。鹰属鸟类，在史前时期，人类对于鸟的崇拜是溢于言表的。

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屡见不鲜的与鸟有关的材料就是极好的说明^[1]。诸如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环太湖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都有大量鸟的造型和纹饰的艺术品。由于材料众多，此处难以尽举，我们拟例举几件典型的，来归纳鸟文化崇拜中的本质属性。

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见到过“双鸟朝阳图”（图5），双鸟对称，鸟身上的同心圆纹，耀着光芒，无疑是太阳的象征。太阳与鸟的“通假”性很可能在河姆渡人的心目中已见萌芽。^[2]这种“通假”、“对应”在良渚文化时期仍然大量可见。良渚文化玉器的琮、璜、三叉形饰、冠状饰上均有这类鸟形象。鸟身上也有圆或同心圆纹，均为太阳的象征。

除了艺术形象中反映了鸟与太阳的关系外，在后世的文献记载中，太阳与鸟的对应关系更加确定。《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踶鸟。”“踶鸟”即“三足乌”或“金乌”。鸟之所以与太阳相联系，可以归结为一种原始思维。太阳每日东升西落，火球无翅而不坠，初民认为是鸟背负着太阳飞行。《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1



2

图5 史前艺术形象中的鸟和太阳

[1] 有的学者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鸟形象做了专门研究。可参见黄厚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鸟形象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4年博士论文。

[2] 蒋乐平：《浙江史前鸟像图符的寓意及流变》，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既然鸟与太阳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那么鸟具有太阳的属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太阳是万能之源,鸟是太阳的象征,集生殖力、光明、能量于一身,其属性是象征阳性的。^[1]

三

再来看猪首。猪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最重要的家畜之一,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许多新石器文化中,发现有葬埋猪,包括猪头、猪颌骨等的习俗。这种习俗的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大略以山东为重心,北达松辽,南逾长江,东濒大海,西至陕甘。^[2]要理解凌家滩玉鹰上的猪首形象,应当置于整个史前猪文化崇拜的背景中。关于史前文化中葬猪的意义,王仁湘先生精辟地指出,葬猪含有宗教的意义,可能是对死者灵魂的一种护卫^[3]。对此,凌家滩发现的玉猪也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在凌家滩遗址最近的一次即第五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编号 07M23 墓坑填土的上方,发现一件大型玉雕猪形器,长约 72 厘米、宽 32 厘米,重达 88 公斤(图 6-1)。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整件器物形态逼真,吻部突出,嘴部雕刻明显,其上有两个鼻孔,在嘴的两侧刻有向上弯曲的一对长獠牙。眼睛用减地法表现,在头部上方以同样方法刻出一对向上竖立的耳朵。颈部略加琢磨,形成一个较宽而浅的半圆形脖子。在腹部的一侧,简单地琢出两条弯曲的线,形似蜷曲的双腿或带翼的翅膀。从颈部至尾部皆保留玉籽料原貌,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痕迹。这么大的一件玉猪,而且是放置在了墓坑填土上方,与凌家滩 87M4 墓口填土上面放置的一件巨形石钺颇为相似。论者认为它是用来表明墓主人的地位,是财富和权力的象

[1] 有关鸟是阳性生殖力象征的论证,详见徐峰:《马家窑舞蹈盆及相关彩陶纹饰的文化隐喻初探》,《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编,2004 年,第 305—316 页。

[2] 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原始宗教文化遗存探讨札记》,《文物》1981 年第 2 期。

[3] 徐峰:《马家窑舞蹈盆及相关彩陶纹饰的文化隐喻初探》,《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2004 年。

征,突出表明了墓主人的权力、地位及其信仰。^[1]但笔者认为王仁湘先生的观点可能更为合适,即这件玉猪应该起的是一种镇墓、驱邪、护佑的作用。此外,凌家滩遗址更早时候还出土过一件玉猪(87M13:1),器形与07M23的这件非常相似,只是体积要小。这件玉猪为玛瑙,乳黄色,半透明,表面琢磨光滑,利用玛瑙的自然形状稍加琢磨,琢磨出猪嘴、猪头部,眼睛利用自然孔洞磨光而成,顶部有三个自然孔洞,最大孔与眼孔相通。猪背圆弧肥大。猪尾部有一个浅的自然孔。整体形象栩栩如生(图6-2)。由此可知,猪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凌家滩先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的精神或宗教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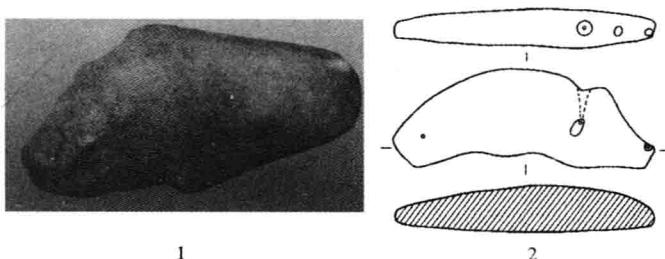


图6 凌家滩玉猪(07M23填土、87M13:1)

四

继续对八角星纹进行解析。与上述鹰、猪不同的是,八角星纹不是具象的动物,而是一抽象的符号。相同的是,八角星纹同样分布范围广阔,北至内蒙古,南逾长江的史前文化中,均有八角星纹的发现(图7),尤以东方沿海地区,如海岱区和太湖区最为密集。八角星纹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学界尚有争议。有太阳说^[2]、四鱼相聚族徽说^[3]、“巫”字说^[4]、织机部件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2] 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李修松:《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4] 李学勤:《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中国文化》1992年第6期。

说〔1〕、花蒂说〔2〕、龟甲囊绳索捆绑说〔3〕、九宫说〔4〕，等等。一个外形并不复杂的符号，引来众说纷纭，既是史前探索的热闹有趣之处，也难掩史前艺术符号文化阐释的尴尬。论者经常会陷入“盲人摸象、各见其摸”，不知谁是谁非的境地。关于八角星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5〕，限于篇幅，此处仅择取主要观点述之。八角星纹的各类观点虽然看似矛盾，但彼此间实有密切之联系。我曾建议特别关注龟甲囊绳索捆绑说、“巫”字说和九宫说。破除表面的歧异，致达内涵的一致。龟甲囊绳索捆绑说的提出者王育成先生认为新石器时代东方沿海地区的龟甲大多经过整治，有的有穿孔和绳绑的痕迹。他指出，有“×”的方心八角形图案是绑缚后的腹甲图案，无“×”的是未捆扎的（图8）。从中可以看出，八角星纹与龟的腹甲有关。王育成在论证之末还援引了始皇陵兵马俑吏俑铠甲上的八角星纹，从象征的角度指出，将八角星纹绘于铠甲之上，取龟甲坚固、龟灵长寿以佑护甲士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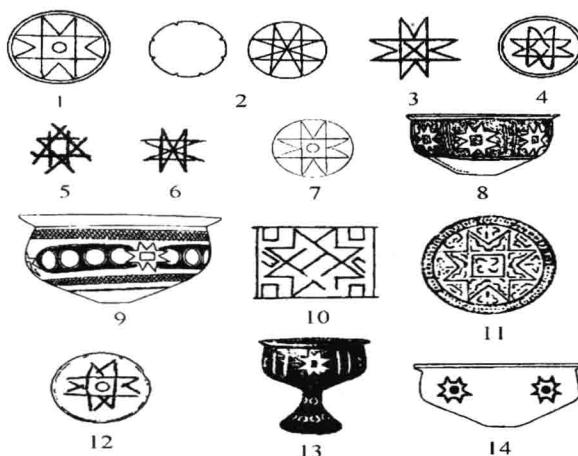


图 7 新石器时代八角星纹

李学勤是将八角星纹解读成“巫”字。在甲骨、金文中，巫字作“卍”，与

〔1〕 王矜：《八角星纹与史前织机》，《中国文化》第二期，1990年。

〔2〕 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3〕 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年第4期。

〔4〕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73—394页。

〔5〕 徐峰：《史前“八角星纹”原型探析》，《文物研究》第19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12年。